

## 论《新安志补》的价值

肖建新 李永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图书馆,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明代方信撰修的《新安志补》,是一部特殊形态的方志,在方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收集保存了大量有用资料,并在资料剪裁、体例安排、建构类目等方面比较严谨,还有史料史实的钩沉考辨以及浓厚鲜明的修志观念,都决定了这部志补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反映出明代方志观念和体例上的新变化。

[关键词] 明代 方信 《新安志补》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12)02-0103-09

在我国历史上,新安或徽州是具有典型区域文化特征的地区,同时,也是古代方志编修绵延不绝的州郡。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是徽州以及安徽现存最早的方志,更是我国地方志成型时期的经典之作。此后,续修不断,宋元时期多以新安而名,明清时期常以徽州而名,即续修《新安志》或《徽州府志》。而明朝后期世宗时歙县方信,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撰成的《新安志补》<sup>①</sup>,仍以新安而名,这在明清徽州方志续修中极为少见。就内容而言,作者在凡例中说“《新安志补》,补弘治壬戌旧志之阙及拾罗鄂州《新安志》之遗,正讹辨疑,准李肇《国史补》之例。”显然,对《新安志》和《徽州府志》这两部重要方志进行拾遗补阙、正讹辨疑,这本身就很有意义了。尽管这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志,属于方志资料补充性的著述,但仍较为系统,有一定的体例,有其价值和地位。

《新安志补》在成书过程中,方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朋友的鼓励下才面世;而奇怪是,付梓后在明清时期流传不广,现存更少,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的藏地,全国只有数家,几乎湮没。目前,对此缺乏整理,更无论研究了。近几年,我们在研读和整理此书时,发觉作者及其著述都有一定地位,尤其是《新安志补》在体例、史料、志观都有独到之处,对徽州方志编纂当有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明清方志的变化,因而《新安志补》不是一般续修的方志,而是对经典方志的补充和发展,这在古代并不多见,值得挖掘和研究。

### 一、《新安志补》的结构及其体例价值

《新安志补》八卷,近三万字,著述十分简练,它既不是完整的方志,也不是材料的胪列排比,而是针对《新安志》和《徽州府志》的内容,确立自己的结构,既有沿袭,又有整合,尤其是补充,显示自己的特点。为了便于分析《新安志补》结构上的特点和价值,现将三部志书目录列表如下:

[收稿日期] 2011-02-28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会项目“《新安志补》点校及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建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宋史;李永卉,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宋史。

① 关于方信及其编纂志补的情况,又撰有《方信及其编纂〈新安志补〉考》一文,即将刊出。

## 论《新安志补》的价值

《新安志》、《徽州府志》、《新安志补》目录

卷次	《新安志》	《徽州府志》	《新安志补》	
一	州郡 沿革 分野 风俗 封建 境土 治所 城社 道路 户口 姓氏 坊市 官府 庙学 贡院 放生池 馆驿 仓库 刑狱 营寨 邮传 祠庙	地理一 建置沿革 郡名邑名附 分野 疆域里至附 形胜 风俗 山川 城池 坊市 相隔乡都	沿革表补 大事表补	
二	物产 穀粟 蔬茹 药物 木果 水族 羽族 兽类 畜扰 货贿 贡赋 税则 杂钱 夏税物帛 小麦 秋税糙米 折帛钱 进贡 供物帛 上供纸 酒课 税课 茶课 盐课 公用	地理二 桥梁津渡附 古迹 丘墓 食货一 田地 户口 水利 土产 土贡	分野补 封建补 灾祥补 赈恤补 土产删 制科补 丘墓补	
三	歙县 沿革 县境 镇寨 户口 田亩 租税 酒税 城社 官廨 乡里 道路 桥梁 津渡 山阜 水源 古迹 祠庙 道观 僧寺 丘墓 碑碣 贤宰	食货二 财赋军需徭役附	监司补	
四	休宁 祁门 五县事目略如歙县	封(建)爵威晚附 封爵 (威晚) 职制 (龚慎仪见名宦志) 郡邑官属 兵卫官属 (郡邑官属) (兵卫官属) 名宦	武功补 艺文补	
五	婺源 绩溪 黟县	公署 (上司公署) (郡邑公署铺舍附) (兵卫公署) 学校书院堂塾楼舍社学附 祀典 坛壝 祠庙 恤政 仓局库院义塚附 蠲赋赈饥养老附	郡守补	
六	先达 程仪同 程都督 吴御史 王校正 汪处士 舒状元 吕侍郎 大魏太尉 查秘监 张度支 许司封 许承□ 谢谏议 张密学 小魏太尉 查贤良 俞待制 俞侍郎 洪比部 聂内翰 许待制 许长官 吕状元 孙工部	选举 科第 歳贡(援例入监附) 荐辟 吏材	邑令补	

续表

卷次	《新安志》	《徽州府志》	《新安志补》
七	先达 王提刑 汪宣德 洪尚书 胡金部 胡司业 黄侍御 汪丞相 程显学 凌待制 汪内翰 胡待制 汪少卿 胡殿院 先君尚书 朱吏部 汪枢密 金尚书	人物一 勋贤 儒硕 文苑	师儒补
八	进士题名 贤良方正一人 进士贡士二百三十四人 明经二人 发运使赐第二人 乐成献颂并铨试赐第四人 贡士献口一人 特奏名三十三人 武举四人 义民 黄芮 章氏二女 汪廷美 叶氏女 詹惠明 仙释 方储 许宣平 聂师道 聂绍元 丘寺丞 郑姑 程惟象 张扩 智琚 定庄 茂源 谦禅师 澜大德 雪山子 宁道者 宗白头	人物二 宦业	兴学补 除弊补 廉吏补 宰辅补 卓异补 甲科补 再任补 效死补 良师补 聚斂补 游田补 叛吏补
九	牧守 吴五人 晋三人 宋十二人 齐五人 梁十二人 陈五人 唐三十六人 吴杨氏三人 南唐一人 国朝宣和前二十九人 宣和后见壁者三十六人	人物三 忠节 孝友 义勇 武功 封赠 隐逸	
十	杂录 人事 诗话 杂艺 砚 纸 墨 定数 神异 记闻	人物四寓贤 列女 艺术 仙释 宫室 寺观 祥异	
十一		词翰一 辞命 表疏 书 题跋 论 杂着 启 上梁文 祭文 铭箴 赞颂 辞赋 诗章 序	
十二		词翰二 记 拾遗	

由此可见,《新安志》和《徽州府志》都是纲目体方志,结构严密,并且超越宋代以前方志侧重山川形势、物产风土等特点,形成从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文化角度叙述地方的历史,包括自然条件、行政环境、文化成就以及人物风范等,<sup>①</sup>具有宋代以后方志的存史、资政和教化的基本功能,文

<sup>①</sup> 参见肖建新《〈新安志〉新论——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之价值》,《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化史色彩渐浓。不过,前者内容安排先总后分,逐步展开,而后者更侧重分项,尤其地理、食货,或者说政治、经济的记载,卷数和篇幅都有所加大。而《新安志补》属于志书范围,但又不是完整的方志,它不是改造方志体例,也不是在已有方志体例框架内的简单补充。从《新安志补》的目录看,显然它没有拘泥于相应的纲目和体例,一一对应地去补充,而是大致照顾上述二志叙序的同时,又有所调整,甚至重新分类编次,具有传统方志条目体的影子。当然,分类设目是形式,关键的还是内容,既具有史实、史事汇聚的功能,又有通过分类补充反映徽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就《新安志》、《徽州府志》同名类目的内容增补。据上面三志的目录表可知,《新安志补》的标题与前两志相同的主要集中在二、三卷,如《分野补》、《封建补》、《丘墓补》。此外,卷五《郡守补》、卷六《邑令补》与《新安志》卷九《牧守》、卷三《贤宰》;卷四《武功补》、卷七《师儒》、卷八《甲科补》与《徽州府志》的卷九《武功》、卷七《硕儒》、卷六《选举》等目录相近或相同。而所补内容丰富,如《分野补》,依据《晋书》、《唐书》的《天文志》,以及唐代僧一行观点,对分野的具体位置作了叙述。又如《封建补》,按时代先后,补有王、公、侯、伯、子、男、子、郡县君、夫人等,历朝封于新安的人数众多,作时代性的分封排列,理出线索,便于专门研究。《郡守补》、《邑令补》等也是如此,内容极为丰富。

二是建立新类目,梳理归类增补。从目录上看,《新安志补》较之前两志,不但有相同或相似类目的增补,也建立了新的目录。如卷一《大事表补》,大多依据正史以及包括《新安志》、《徽州府志》的已有记载,取材严谨,对新安历朝发生的重大事件梳理。这对于把握和研究新安历史的发展脉络很有意义。同时,也对方志的体例创新有一定积极意义。其他如卷二《灾祥补》、《赈恤补》、《制科补》,卷三《监司补》,卷四《艺文补》,卷七《师儒补》等,均与前两志有所不同,灾赈关乎民生、制科为特殊的选举、监司超越州郡官吏的范围、艺文有正史艺文色彩、师儒实为地方教育官吏序列。这其中主要是记载的视角不同,视野的扩大,内容的补充。而卷八的增补类目更多,如《兴学补》、《除弊补》、《廉吏补》、《宰辅补》、《卓异补》、《再任补》、《效死补》、《良师补》、《聚敛补》、《游田补》和《叛吏补》,将历史上徽州多种特殊类型的人物作专类补叙,也就是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的褒贬来警示和教育后人。这种分类已经超过了方志一般“条目”的作用。

此外,《新安志补》主要是增补和更正《新安志》和《徽州府志》的遗漏和讹误,唯独卷二中的《土产删》似有些不可思议了。方信认为“旧志土产率皆委琐,列子所谓为乡豪笑者多矣。余耻其志之滥庸而削焉。”<sup>①</sup>他认为《新安志·物产》和《徽州府志·土产》,太过滥庸,没有体现出地方特色,只要保留纸、墨、砚、茶等就行了,其余如谷粟、蔬茹、药物、木果、水族等,尽皆删去。其删除的标准是“惟采其殊常者志之,以备郡乘之一体。”<sup>②</sup>其实,这是新安旧志,尤其罗愿《新安志·物产》的得意之作,清代四库馆臣的《新安志》提要,更是给予高度评价,“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备”。<sup>③</sup>为此,方信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质疑和批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提要以征引该备称之,而信反以为委琐,谓诸物亦他郡所有,不足矜尚,惟删除纸墨白紵药物十余种,则弥失愿本旨矣。”<sup>④</sup>

上述结构或体例的设置或调整,实质上就是要服务于一个体例的设想,即他在凡例中提出的一个原则“准李肇《国史补》之例”。其实,若将《新安志补》与《唐国史补》作一比较,形式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唐国史补》可以说是纯条目标体,“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每条以五字

① 方信《新安志补》卷二,明嘉靖刻本。

② 方信《新安志补》卷二。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④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4册,第772页。

标题。”<sup>①</sup>但是,这不是李肇例的本质,重要的是他在自序中所说的“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sup>②</sup>关键是后者,方信追求的也是后者,上述结构或体例上的调整印证了这一点。为此,方信“准李肇《国史补》之例”,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主要在志补内容和材料的选择和取裁上。这涉及修志的观念或方志观问题,后面有所涉论。

## 二、《新安志补》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新安志补》的体例和体裁决定了之后,此书的成败在于资料的来源和丰富,前者决定著述的体系,后者决定著述的质量。我们对《新安志补》直接注明的资料作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有史书和文集经书两大类,在史书类,正史引用约百余次,其它政典、方志等也有五六十处;文集引用更多,一百五十余次,而经书等也有约二十处,总的文献近百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引用仅是有出处的,再加未注明的则更多,这对于一部约三万字的著作来说,可见其材料的丰赡。这种处理方志材料的方法很有史料汇聚和剪裁,以及史学研究的特色。这与方信的史学素养当有直接关系,他的同乡郑绮,嘉靖时赐同进士出身,<sup>③</sup>就听人称赞他“好古昔修《金陵志》,有良史才,验之今日,信然。”<sup>④</sup>在古今多种学术中,应该说修史的要求很高,需具备“才、学、识”的基本素养,清代的章学诚就叹曰:“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sup>⑤</sup>而方信以史家的素养来作方志的补,在史料收集、史事归纳、保存资料上必然驾轻就熟,质量更有保障,价值也更高。

《新安志补》八卷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史料来自于正史,占有较大的比例。其实,志补的凡例就有很好的说明,凡例共九条,其中六条按照正史以及史书的规则来处理的,如第二条关于补太守、都尉的原则就是参照《汉书》方法。为此,在志补中正史材料可以说俯首可拾,如卷一《大事表补》的绝大部分史料均来源于正史,将新安从秦汉至明朝发生的大事,按时间顺序作一梳理,叙事简洁。又如卷二《封建补》、《灾祥补》、《制科补》,卷三的《监司补》,卷五《郡守补》,卷六《邑令补》,卷八《兴学补》、《除弊补》、《宰辅补》、《效死补》、《良师补》、《游田补》和《叛逆补》等,都有相当的正史资料。而在引用时,方信不是照抄原文,而是经过选择和判断后编撰的。因而,他根据这些材料,对《新安志》和《徽州府志》的错误或不确之处,作了纠缪和订正。例如第一卷《郡邑沿革表补》,新安在唐代武德、永徽、开元、永泰年间的变迁,方信便依据《唐书·地理志》,将《新安志》中的错误加以订正。又如关于绩溪的沿革,《新安志》载永嘉二年“析歙之古华阳镇置绩溪县”<sup>⑥</sup>,而《新安志补》则说,绩溪“上,永徽五年,析歙华阳镇置。”即永徽五年置析置,提前了一百多年。此外,还据史籍对各县的等级作了补充。

志补除了大量引用正史资料外,又引用其它史书,包括政典、方志,甚至志补的标识方法参照王应麟《玉海》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格式,补守令的体例参照《新安志》,都是凡例定下的原则。当然,更有特色的是志书的引用。这种引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补充辩正《新安志》以及《徽州府志》的同时,还充分挖掘其中的材料作为志补相关内容的有机组成。这一点往往为人们忽视,似乎

① 李肇《唐国史补·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李肇《唐国史补·自序》。

③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7,明万历刻本。

④ 《统谱》卷2,《各派族谱序跋记考·灵山方氏宗谱序》。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内篇三·史德》,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旧版影印,1988年版。

⑥ 萧建新等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5页。按:实际上,《新安志》所系在“永嘉”元年之后本身不确切或有误,因方清之事在永泰元年,据此“永嘉”当改为“永泰”,见《新唐书》卷二十四、一百四十七。为此,《新安志补》给出另一个年代“永徽五年”,值得注意。

没有增补什么,缺少一点发明,实际上反映出作者的别出心裁,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卷一《郡邑沿革表》引用《新安志》卷一《州郡沿革》材料,有的还加了按语,从而使沿革以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脉络非常清晰,也有学术价值。这不是《新安志》内容的简单重复。二是引用其它总志、专志等材料,包括《大明一统志》、《宁国府志》、《齐云岩志》、《太平府志》、《嘉兴志》、《抚州志》、《韶州志》、《休宁志》、《青州志》、《大冲山志》、《润州志》、《池州府志》、《台州府志》、《续新安志》、《城社志》等,这些志书相对于《新安志》上的资料来说引用频率并不高,但是,其补充、保存史料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某些志书如今较难找到了。

志补还引用大量文集,如《柳子文集》、《篁墩文集》、《赵东山文集》、《朱同文集》、《凌唐佐文集》、《许山屋文集》、《周益公文集》、《李西涯文集》、《王忠文公集》、《杨文贞公集》、《汪蓉峰集》、《吴石溪集》、《程黟南集》、《金薤琳琅集》、《程都官祁集》、《钟启晦集》、《方虚谷集》、《戴剡源集》、《杨刚中集》、《钟启晦集》、《梧冈集》、《曹东白集》、《王鹤山集》、《程黟南集》、《潜溪集》、《李文达公集》、《罗鄂州集》、《朱子范集》、《揭文安公集》、《张文信公集》、《王提刑集》、《黟南集》、《吕左史集》、《虞文靖公集》、《曹弘斋集》、《梧冈集》、《钱学士集》、《杨文定公集》、《唐筠轩集》、《王鹤山集》、《李蒙斋集》和《钱文通公集》等,其中,有的较有名,有的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了,汇集于此,价值很高;还有家谱、族谱,如黄氏谱、方氏谱、徐氏谱、夏氏谱、汪氏谱、凌氏谱、毕氏谱、曹氏谱、田氏谱、金氏谱、闵氏谱、冯氏谱、余氏谱、宋氏谱、章氏谱、李氏谱、孙氏谱等,这些方氏所见的谱,估计现在也大多难见,留下的材料更为珍贵。此外,还有其它史料,如各种记。方信就是集腋成裘,有机编排,成为系统的材料,如卷六《邑令补》,将分属于新安、徽州志中的各县令长辑录而出,再补以正史、志书、文集、谱等而成,尤其是补充的部分,后两者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如元代歙县令长,从家谱、文集、方志等文献中辑录;又如歙县达鲁花赤哈利不花、歙县令李维即出自《章氏谱》和《李氏谱》。尽管记载都很简略,但终于将二人勾沉出来,并流传下来,也使我们知道当时有这两种家谱。

此外,还引用一些经籍资料,包括《诗》、《尚书》、《礼》、《春秋》等,这类资料大多作为补志的指导思想,反映他的方志观,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特色。这将在的后面有所专论。

总之,《新安志补》的史料来源可靠,剪裁严谨,且不是单纯的引用,而是加以总结、归类、钩沉和补充。这种使用资料的方法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也创构了方志体例中新的类目,完善新安方志的内容。这些补充大多很有体系,《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地说“罗愿《新安志》叙述简洁,世推善本,独惜徵采尚有所遗,如志郡守始自孙吴,然秦并天下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汉元封初,改鄣为丹阳,使都尉分治于歙,东汉建武中省都尉,并于太守。是丹阳太守,实统黟、歙,亦守土长吏也,乃一切省削,非是。他如制科、邱墓,皆有脱漏,信一一据史籍补之。又郡守以上补监司,以下补邑令、学官,或据史籍,或据诸家诗文。原志无表,信仿《史记》诸表例,创为沿革、大事两表,皆能补愿所不及。”<sup>①</sup>为此,这些补证,相对于一事一人来说,固然有其拾遗补阙的价值,孤立地看也许价值不够突出,但综合起来考察,把这类材料统一在前述各类内容的框架体系内,则其对方志的完善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就有很大的价值了。

### 三、《新安志补》的修志观表现及其方志理论价值

《新安志补》的篇幅虽不长,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方志,但有序、凡例、小篇序,并且编排格式参考正规的政典、类书,尤其凡例是规范之作,小序是点睛之笔,都是方志趋向成熟的标志,很有方志成型以后的发展态势。这些内容及其编纂充分反映出他的修志观念。

在序、凡例中,方信分别表达不同的补志旨意,前者表达两个想法,一是以修史的态度补志,二是通过不断批判,完善方志;后者表明两个方面的态度,一是补志的原则,参考史志,二是对旧志的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34册,第772页。

继承和发展。因而,从本质上讲,他的序、凡例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呈现出修志如修史的价值取向。他的修志观或补志观表现以下几方面:

一是补志的“志犹史”价值取向。穆文简公所言“志犹史也”,修志也应有三长,要有褒贬惩劝,并且正误补阙,求真求实。方信当然受此启迪,在补志时趋向“志犹史”的编纂取向,况且他还有“良史之才”。这一点还从别人对评价中得到印证。嘉靖时,同乡郑绮在为他续修方氏宗谱的序言说“志地里者,示桑梓也;志丘墓者,示孝思也;志祠庙者,示祖功也;志贵戚者,示门望也;传文学者,作士向也;传忠义者,振士气也;传烈女者,贞女志也。且得东莱吕氏之系法,族疏者,虽贵必削,族亲者,虽微必录。好古之心,不亦渊乎!”<sup>①</sup>这固然是称道他的修谱,实际上也适用于他的修志。因为,地理、丘墓、祠庙、贵戚、文学、忠义和烈女等是方志的基本内容,只不过方志是一地之史,家谱族谱是一家一族之史,明代“谱犹史”的观点同样流行,即谓“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sup>②</sup>

其实,“志犹史”的观念,不是穆氏的发明,只是方信直接受到他的启诲。“志犹史”,是宋代以后逐渐形成。宋代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监,甚重典也。”<sup>③</sup>明代此类说法更多,庄泉在《定山集》卷七《长兴县志序》中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与志虽有小大不同,其示劝惩则一而已矣。”郟相在嘉靖《河间府志序》说“古有列国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虽名谓有殊,而核名实以记时事者,其义同也。”也就是说,在方信所处的嘉靖时期,“志犹史”的观念已经盛行,方信以此理论和方法来补志也就非常自然,并且比较突出。

因而,他补志的史著意识强烈,并贯穿到实践中,如“仿《史记·王子侯年表》作郡邑沿革表补”,“大事表仿《史记》大事记”,“余仿《汉书·艺文志》,作艺文志补”等。这是直接明言参考史书形式而作志补,还有大量的的是根据凡例的原则,进行一系列史著式的编纂,所谓补两汉太守准《汉书》、佚名者称某姓公准汉书、一官联志数人者准《汉书》、《唐书》、载官卑者准《唐书》、记可征可劝可惩者也准史书等,至于具体处理的案例更多。显然,这是追求史书的著述范式和方法,重视资料的来源、取舍、斟酌,发挥史学求真务实、发微索隐的功能。

二是补志的劝善贬恶追求。本来秉笔直书是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刘知幾在《史通》中早就说过“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直书不避强御”。<sup>④</sup>但是,志书又有为乡贤、为长者讳的传统要求。罗愿的《新安志》当为公认的经典志书,但他在这方面的处理也受到后人的质疑,四库馆臣说“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记愿所作胡舜陟墓志,后曰‘鄂州《新安志》于王黼之害王俞、秦桧之杀舜陟,皆略而不书,苟非得虚谷一白之,则其迹泯矣。然则,是书精博虽未易及,至其义类取舍之间,疑有大可议者。”不过,后面还是指出“愿之不书,殆非无意,未可遽以为曲笔也。”<sup>⑤</sup>甚至,后来有人指出罗愿隐讳其父事秦桧之事。其实,罗愿在方志的直书实书上做得还是不错的。直书的焦点在善恶皆书,目的是为了劝善贬恶。

方信在自序中,就载有穆文简公的“惩劝”期待,于是“翼翼乎,刚求如儒”。他对郡乘的舛错讹惑甚表不满,认为“将使斯人贤者不幸,而无闻不肖者幸以盖矣。”而在凡例中更有一条原则“作可劝者九志,可惩者三志,<sup>⑥</sup>准史书循吏、酷吏、孝友、奸叛传之例。”明确表达惩劝的态度,这在第八卷有集中的反映,劝善九志是:兴学补、除弊补、廉吏补、宰辅补、卓异补、甲科补、再任补、效死补、良师补;惩恶三志是聚敛补、游田补、叛吏补。显然,方信把善恶放在一卷,尤其是除弊补、廉吏补、效死补与聚敛补、游田补、叛吏补的前后对比色彩非常鲜明,其用心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一方面表彰

① 《统谱》卷2,《各派族谱序跋记考·灵山方氏宗谱序》。

② 蔡清《虚斋集》卷3,《凌云叶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广陵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④ 刘知幾《史通》卷5.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⑤ 《四库总目提要·新安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⑥ “可惩者三志”,厦大本作同,北师大本作“可惩者三史”。

乡贤,展现历史地方官吏的德政;另一方面对横征暴敛、游戏荒政、临阵脱逃的败类加以鞭挞。这只要对比一下小序,更能说明问题,除弊补序曰:“昔召信臣守南阳,好为民兴利,利兴而弊除,云新安守令兴利除弊如信臣”;聚敛补序曰:“《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余诵其言而悲之,悲其猛于盗。”前者除弊为民,后聚敛残民,二者的差别再也明显不过了,将他们并列著于志书,定起到惩劝教育的作用。

当然,直书善恶,惩劝并重的做法,在志补的其它部分,通过稽考补充史事史实表达出来,如在卷六《邑令志补》,方信说“南朝以前新安邑令之名吾不知已,旧志邑令自南朝以迄明兴,阙略夥够,俾斯人蚕绩蟹匡,声称汨没,而不能奉职循理者,亦以掄也。岂励世之机耶!”<sup>①</sup>其中,的确增补了自南朝至明代确不少功成名就的邑令,同时,也勾稽出一些蚕绩蟹匡、名不符实,以及不能奉职循理的官吏,并通过后来者来励世警世,可见,其劝善惩恶的用心。至于具体记载,无须一一胪列。这一做法是与前述“志犹史”的补志理念相吻合的,也是对传统方志避讳的做法反动。

三是补志的经世致用努力。发挥志书的劝惩功能,也是史学功能,实际是为经世致用服务的,而前面叙述志补引用《诗》、《尚书》、《礼》、《春秋》等经书时,初步指出他的经世致用的观念和思想。这在《新安志补》的具体著述中,方信作了明确的回答,在卷三引用《诗》,他说“尝诵《诗·宾筵》,至‘凡此饮酒,既立之监,监立而仪孔嘉矣’”,以此来作《监司志补》。又如在卷二引用《周礼》,“余读《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作《分野志补》;“余读《周礼·大司徒》:‘以荒政聚万民’”,以作《赈恤志补》;“《周礼》:‘墓大夫,以掌丘墓’”,以作《丘墓志补》。显然,方信在补志时,经世致用,把儒家的德政思想贯彻到自己的实践中。

关于地方的治理和官吏的德政可谓是志补重点记载的内容,卷一中《大事表补》形式上是仿《史记》的大事表,本质上则是为了“观其大事而示民厚心恩”。在他看来,“旧志阙表,大事乃郡之典礼,德罪暖而弗章”,也就是说,“大事”关系民心、制度,与地方治乱联系在一起。而在卷二《封建志补》中,方信就赞同司马迁将汉代淮南、衡山二王亡国归咎于“俗薄”,也就是没有把地方治理好。为此他把以往历史上的王、侯、公、伯、子、男等开列出来,让后人去评判。在《灾祥志补》中,他还认为“夫灾者,德政之否,祥者,德政之臧也。灾祥不书,书之不详,非惟德政无征而戒心弛矣!”可见,灾祥不只是记载灾异和祥瑞的现象,而是反映德政的臧否,也就是施政的好坏,以此警戒后人。《赈恤志补》的目的更为明显,“荒政不讲,民膏以散,国非其国也!”赈恤是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生活的稳定和国家的存亡。《土产志删》历来受到非议较多,其实,他“耻其志之濫庸”的理由有些特殊,强调“俭约”和防止“口腹心害”,具有节俭薄征和宽恕仁政的内涵。至于卷二中《丘墓志补》也是为了“施哀于民”;卷三《监司补》是为了“序王人”,即地方的有效治理;卷四《武功志补》更记载那些“触白刃,冒流矢,提兵兹土,平定寇难”的材武,维护地方治安和保卫邦土;至于卷五《郡守志补》、卷六《邑令志补》中的“存树威恩”、表彰劝惩都与地方官吏治绩相关。总之,在志补中地方官吏及其治理内容占有很大篇幅,反映出儒家传统的德治仁政倾向。

关于地方的人才和文化成就也是志补侧重记载的内容,这是经世致用的基础和反映。志补所载重要人物和人才很多,这一点姑且不论,而在卷二《志科补》中强调“野无遗贤”,尤其要重视特殊人才;在卷四《艺文志补》中指出,经籍“寔籍鼓吹文章者,乃政化黼黻,皆为治之具也。”何况新安为“东南邹鲁”,更应重视文化,并通过书籍观察社会人文。为此,在卷七《师儒志补》之所以记学官、书院山长,卷八《兴学志补》载兴办学校,既展示宋代以后“新安自昔多良师”、“比齐鲁”的文化优势,也是为本地的“大化”,即通过教育、教化、文化推进本地的社会发展,显然这是前述经济、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或更高追求。为此,方信补志时的史家意识、文化意识很浓,也就赋予《新安志补》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sup>①</sup> 方信《新安志补》卷6。



## 结语

本文是在初步整理校勘《新安志补》后撰写的,总的感觉该志补丰赡、简洁、精练、有法、涵蕴、旨深,上述三方面的价值估计当应较为客观。故明代吴子玉赞曰:“罔不搜索遐隐,补坠正讹,上自汉唐,下至于兹,遗珠残贝,烂焉可观矣。”<sup>①</sup>清代周中孚称之“叙次简括,有古志之遗意”。<sup>②</sup>同时,必须指出,《新安志补》也难免舛讹差误,罗振玉在《雪堂类稿》中指出:

惟末卷实皆名宦,而列目系碎,意本劝惩,然舍土著而绳守土之吏,宾主之义已乖。原志封建断至唐,而武三思子崇烈封新安王,颖王子(倓)封颖国公,汾州刺史王诠封歙县男之类,信亦一一补之,下至帝姬内子,不知后世王侯虽名系郡县而事殊茅土,补之反为蛇足。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提要以征引赅备称之,而信反以为委琐,谓诸物亦他郡所有,不足矜尚,惟删存纸墨视白纈药物十余种,则弥失愿本旨矣。

后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基本沿用此说<sup>③</sup>,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卷八(末卷)列目琐碎,属于体例不纯;二是卷二《封建志补》所收人物过多,画蛇添足,属于内容选择不当;三是专对卷二中的《土产删》,认为尤失罗愿本旨,兼有体例和内容的问题。所指出的这些不足,确有一定道理,值得我们使用时注意。其中,第三点总体上说还是对的,同时,又要注意方信与罗愿对物产的态度差异,方信有强调“俭约”和防止“口腹心害”方面的用意,而罗愿侧重于物产经济的考量,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必过多地纠结。可见,《新安志补》的问题客观存在,但数量不多,问题不太大,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综观全书,盖瑕不掩瑜焉”,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实事求是的评判。

总之,这部《新安志补》篇幅虽短,但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正史、方志、文集和其他文献,其中一些资料如今已经不易查找,甚至找不到了,确有拾遗补缺、保存文献的价值;再加上资料剪裁、体例安排、建构类目等方面都比较严谨,还有史料史实的钩沉考辨以及浓厚鲜明的修志观念,都决定了这部志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并能反映出明代方志观念和体例上的新变化。

① 吴子玉《大鄯山人集》卷6,《新安志补》,四库存目丛集部第14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38页。

②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下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9年版,第351页。

③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34册,第772页。

## On the Value of XIN' ANZHIBU

Xiao Jianxin & Li Yonghui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chorography, XIN' ANZHIBU compiled by Fang Xin of Ming Dynasty has some significa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orography and i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compiler collected large amount of useful data and was rigorous in tailoring data, choosing style and setting up category. And the book was based on the strict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ata and reflected a strong sense of compiling chorograph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Fang Xin XIN' ANZHIBU value

(责任编辑 汪高鑫)